

王保顶:历史文化有最深沉持久的力量

本科学习中国古代通史,硕士研究历史文献学,博士选择秦汉史,对王保顶来说,历史就像他的老朋友。硕士时期遍览《十三经》和“二十四史”,因为觉得《左传》很美,喜欢看书中诸侯国之间的交往、外交的语言、引用的远古文献,就把《左传》全文翻译了一遍。这些事情如果不是出于对历史浓厚的兴趣,一般人很难做到。

即使有学术志向和才能,王保顶还是决定离开高校,“当时心里有这种感觉,高校跟整个外部世界是隔离的,对外面变化的、丰富多彩的世界,我们是局外人,一无所知。”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投身社会,这是司马迁、班固等史学大家的毕生追求。冥冥中,他们似乎也影响了王保顶的人生选择。

1998年,王保顶南京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进入江苏人民出版社,刚入社就参与编辑“海外中国研究丛书”。20多年来,王保顶在学术出版领域深耕,策划、主持《南京大屠杀史料集》《中国美学通史》《世界现代化历程》《英国通史》《德国通史》《日本通史》《英帝国史》《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》《丝绸之路》《吾国与吾名》等重大项目和重点图书。

在出版领域孜孜不倦之余,王保顶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投入心血写下的前四史介绍与研究,并将它们重新整理出版。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的原典,对现代读者来说毕竟有距离、有门槛,而王保顶的《前四史解读》集趣味性、通俗性和思想性、学术性于一体,让厚重的历史典籍变得平易近人。

一路走来,王保顶相信历史文化中蕴含着一种最深沉、最持久的力量。前几天回到老家大别山为中学校长庆祝八十大寿,王保顶和同学、老师们回忆起上学时贫困、艰辛的岁月:“当时我们每个学生带着自制的油灯,就是墨水瓶里面倒了煤油,再自己用纸搓个芯子。住校的学生住在要走好一段路的邻村楼板上,每个人带一床被子,盖半边垫半边。饭菜是自己带,吃的是咸菜。在那种情况下,我们学校的教学成果还非常突出,中考录取率在全县名列前茅。老师愿意教,学生愿意学,大家都不觉得苦,文化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最自然的需求。书声琅琅,弦歌不辍,斯文在兹,我觉得这里面体现的就是文化传承的力量。”

现代快报+记者
陈曦 姜斯佳/文 牛华新/摄



出版人王保顶

“二十四史”中最好的前四史

读品:《前四史解读》是您在南大读博时参与魏良弢老师的项目写成的,是什么契机让您想要在20多年后重新出版这本书?

王保顶:我工作6年之后,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读博,当时我的导师是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魏良弢先生,他是研究西域史的,学术成果和学术贡献非常巨大。那个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邀请南京大学来做一套“中国典籍精华丛书”,典籍包括得很广泛,有史学、文学、哲学等。我承担的任务很巧,就是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和《三国志》,后来出版也不在一册当中。虽然是20多年前的劳动成果,我自以为还有点价值,于是就以《前四史解读》为名出版。专门介绍前四史的书,这是第一本。

在今年6月2日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,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发言的主题就是“普及典籍文化”,要“让典籍活起来”。司马迁《史记》50多万字,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是10册,一般人也难以看下去,而我的书是导读性的、介绍性的,比较通俗易懂,没想到进入了中国好书月榜。

读品:在“二十四史”中,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最受后人推崇,被认为是最好的四部史书。吕思勉先生评价“二十四史”时认为,非专门治史的人不读这些正史也罢,但前四史是例外,非专门治史的人读了也绝不冤枉。在您看来,前四史与“二十四史”中的其他正史相比,具体好在哪儿?

王保顶:前四史为什么重要?第一,它们开创了正史的体例。纪传体是由司马迁开创,班固、范曄、陈寿加以完善的。最早的史书是编年体,记流水账。但人是历史活动的中心,所以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应运而生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是五个部分:本纪、世家、列传、书、表。班固将世家和列传合在一起,成了纪、传、表、志四个部分,后世基本延续这种体例。后来的“二十四史”,或者加上《清史稿》的“二十五史”形成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完整的记录,这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,他们的贡献不可谓不大。

第二,这四部史书都是独著,之后的史书都是官修的。个人写的,浸润着个人的思想、情绪和性格,所以这四本书无论是从史料价值、文学价值、文献价值,都是其他史书无法比拟的。后面的史书也是纪传体,但也只是形式上类似而已,它们是由朝廷官修的,就是新朝代的皇帝,召集一个班子来写前一代的历史,由一个大臣来负责,它们所体现的多是“成者为王败者寇”的体系。

知识分子与王朝政治的结合

读品: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到《三国志》,修史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,反映了中国思想文化怎样的发展脉络?

王保顶:这四本史书实际上反映了从两汉到魏晋、南朝这几百年间,知识分子与王朝政治结合方式的变化轨迹。知识分子有主体性,而王朝政治是专制性的体现,这两者之间的结合一定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。我另外一本书《汉代士人与政治》,讲的就是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之间,知识分子的四种身份变化:

最早的是游士,包括孔子在内的诸子百家都是游士,他们对治理天下有自己的一套见解,想为人所用,实现自己的抱负,于是满天下跑,哪个国君需要他们,他们就为他拼命效力,所谓“士为知己者死”。当时读书人的价值就在于为天下、为国家做事。

司马迁的时代,汉武帝采纳董仲舒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之议,知识分子整体上转变为儒士。儒士有强烈的天下情怀和使命感,司马迁在受到重大挫折的情况下,依然要坚持写《史记》,为了使他可以牺牲一切。汉武帝统治下的西汉表面上很繁荣,实际上也伴随着深重的危机,司马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写《史记》的实际目的,也是想通过历史的教训来警醒汉武帝,他对兴亡通变的观察都是非常深刻的,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”。

西汉实际上还是外儒内法的,当时的儒士还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,缺乏实践性。到东汉儒法结合,士大夫产生了,班固就是典型的士大夫,就是体制内的人,他的家族世代为官,为王朝政治服务,所以班固《汉书》中体现出的思想就非常符合统治阶层的要求。

士大夫是东汉王朝统治的基础,但是东汉后期发生党锢之祸,宦官依靠皇权,打击士大夫。“锢”是禁锢,就是不让士人做官,这对整个士大夫阶层心理上的打击是毁灭性的,所以知识分子就有了第四种身份——名士。知识分子无法为国家效力,于是张扬个性,吃肉、喝酒。范曄深受这个时代的影响,所以对权贵阶层都看不上。在《后汉书》里面,他对知识分子的个性张扬特别重视,体现出“贵德义而薄公卿”的倾向,正是因为他性格招来了杀身之祸。南朝宋皇帝刘义隆,他有个弟弟叫刘义康,范曄少年时就投入刘义康部下,关系密切,为了报答知遇之恩,范曄参与了推翻刘义隆、拥立刘义康的图谋,最终搭上了性命。临上刑场,他的外甥谢灵运问:“今天上刑场,谁在前面?”范曄说:“贼帅为先。”表现得非常轻松,对生死置之度外,这不就是名士的做派吗?



王保顶

历史学博士,编审,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。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。统筹“海外中国研究丛书”,策划《丝绸之路》《吾国与吾名》《英国通史》《中国美学通史》等知名出版项目,多次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、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。

大读家
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
读书人,写作者

陈寿也属于名士阶层,但《三国志》比《后汉书》成书早一百多年,处于魏晋易代之际,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既受到名士的影响,也有过去士大夫作风的余脉,两者结合在一起。陈寿是蜀国人,后来又又在晋朝,不能不以魏为尊。所以他称曹魏君主为“帝”,其传记为“纪”,如《武帝纪》,而称蜀、吴君主为“主”,其传记为“传”,如《吴主传》《后主传》,这种处理是非常巧妙的。另外这部史书叫《三国志》,听起来三个国家是平等的。

读史不要太功利

读品:提到班固,总会想起钟嵘《诗品》对他《咏史》诗“质木无文”的四字评语,也有不少读者会拿班固《汉书》与司马迁《史记》中的文采作比较,您在书中特辟一节写班固的文风,请您分别谈谈《汉书》和《史记》在文风上各自的优长与短板。

王保顶:“马班优劣论”,二千多年来都在讨论。清朝一个非常有名的史学理论大家章学诚,他写了一本书叫《文史通义》,书中将史籍著述分为“撰述”和“记注”两类,“撰述欲其圆而神,记注欲其方以智也”,并以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作为代表。类似《史记》这样的撰述为“知来之学”,从历史的通变中原始察终,见盛观衰,故不拘体例笔法,是为“圆而神”;《汉书》这样的记注为“藏往之学”,以记录历史为目的,重在体例的安排和史料的采集,整齐划一,客观缜密,是为“方以智”。这两种都是好的,所以司马迁和班固的优劣几千年没有一个定论。

读品:范曄《后汉书》首创《列女传》,被后世偷梁换柱为《烈女传》,您在书中认为“其史识与范曄有霄壤之别”,请您总体介绍、评价一下范曄《列女传》中体现的女性观。

王保顶:“列女”的“列”意思就是“很多女性”,《列女传》中有杰出女性,但更多的是一些普通普通的女性。这也是范曄的特点,他有名士的做派,性格放诞,不拘礼节,他通过这种形式来鄙视礼教。《后汉书》中有很多类传,就是将相同类型的人物归于一传,范曄为社会各色人等立传,比如《宦官列传》《党锢列传》《逸民列传》《文苑列传》、《列女传》也是其中的一种,范曄对他们都是同等看待的,没有什么倾向性。后世偷梁换柱为《烈女传》应该是在宋明的时候,是礼教、道德标准下的女性传,推崇所谓的忠贞、守节。我们后世所讲的所有封建观念,“忠孝节义”等,都是在理学出现之后产生,然后固化为封建社会的秩序,宋朝以前是没那么讲究的。

读品:对当代普通读者来说,读史书、了解古代历史有什么意义,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有什么影响?

王保顶:太有意义了。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成语、典故都是《史记》里面的,比如破釜沉舟、背水一战等等,由《史记》《三国志》的人物故事演绎、改编而成的戏剧、小说等文艺形式仍为人们喜闻乐见,它其实与现实生活是密切相关的。从更深层次来讲,它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,都积淀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当中。

读史就是与伟大的文化前辈对话,在对话过程中吸取知识的力量、精神的感召、文化的引领,感受史学大师的人格魅力,通过史学大师对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的记录和议论,感受到文化的巨大魅力和精神的洗礼,感受到阅读使人生境界升华。以司马迁而论,在身体和精神遭受巨大摧残的情况下,五十多万字通过竹筒记录,是多么巨大的体力和脑力负担!把项羽列为本纪,把孔子、陈涉列为世家,体现了他多么深刻的远见卓识!字里行间文采斐然,议论风生,洋溢着多么蓬勃的文化情怀!更不要说日常之中须臾不可或缺典故、成语了。前四史是巨大的精神财富、丰厚的文化遗产,读前四史就是传承与发展文化,为建设现代文明提供不竭的养分。